



# 批判是启蒙的序曲

## ——对福柯关于康德启蒙观与其批判哲学关系论述的完善和反思

甘从营

**摘要:**福柯认为康德启蒙观的实质在于重新界定理性的自主运用和服从的关系。成熟状态是在合法界限内人们自主地运用理性,超出这一界限则绝对服从,而不成熟状态是两者都服从。福柯认为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其启蒙观的前提:启蒙的关键在于知道理性使用的界限,而批判哲学的核心恰恰在于对理性及其使用进行划界。理性使用的合法与否,取决于理性使用时主体的身份(即是普遍主体还是个人主体)。这不仅适用于启蒙观中理性的公开运用与理性的私下运用,而且适用于批判哲学中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使用。个人主体和普遍主体的区分是联系康德启蒙观与其批判哲学的桥梁。

**关键词:**启蒙观;批判哲学;理性使用;康德;福柯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209

**收稿日期:**2022-11-09

**作者简介:**甘从营,男,河南信阳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E-mail: dg1801007@smail.nju.edu.cn.

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提出了他对启蒙的看法。康德的启蒙观受到福柯的密切的关注,在《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何为启蒙?》、《什么是批判?》这三个文本中<sup>①</sup>,福柯对康德的启蒙观做出了详细而深刻的阐释。研究者们对福柯的相关阐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研究者从现代性的角度研究了福柯对康德启蒙观的解读<sup>②</sup>,也有学者从哲学态度、气质的角度研究福柯对康德启蒙观的解读<sup>③</sup>,还有学者从福柯的“现在的本体论”与康德启蒙一文的关系来研究福柯对康德的解读<sup>④</sup>。然而福柯对康德启蒙观与其批判哲学的关系的阐释却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视,这主要是由于福柯的论述简短且不完善造成的。康德对启蒙的看法与其主要以三大批判构成的批判哲学是什么关系?康德的启蒙观是独立于其批判哲学的,还是与其批判哲学密切相关的?在《何为启蒙?》一文中,康德区分了理性的公开运用与理性的私下运用,这种区分是基于普遍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区分进行的,这些构成其启蒙观的核心,而这两种理性使用方式的区分和两种主体的区分与批判哲学中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所做出的考察有何关系?福柯的相关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他不仅指出了康德启蒙观的实质之所在,而且为我们勾勒出了康德启蒙观与其批判哲学的粗略关系。然而福柯对启蒙和批判哲学的关系的论述并不完整,只有几个段落,他只是提供了看待康德启蒙观及其批判哲学的基

①这三个文本之间的关系可参见:弗雷德里克·格雷《福柯考》,何乏笔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160页。

②参见:张政文《康德与福柯:启蒙与现代性之争》,《哲学动态》2005年第12期,第8—12页;许斗斗《启蒙、现代性与现代风险社会——对康德、福柯、吉登斯之思想的内在性寻思》,《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第121—126页;王立《什么是启蒙:康德与福柯》,《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第24—27页。

③相关研究可参见:Marc Djallah, “Foucault on Kant, Enlightenment, and Being Critical,” in *A Companion to Foucault*, ed. Christopher Falzon, Timothy O’Leary, Jana Sawicki (West Sussex: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264-282; 韩水法《理性的启蒙或批判的心态——康德与福柯》,《浙江学刊》2004年第5期,第26—32页;向林《论康德的启蒙观对福柯哲学的影响》,《世界哲学》2015年第6期,第93—99页。

④相关研究可参见: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Critique and Enlightenment: Michel Foucault on ‘Was ist Aufklärung?’,” in *The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ity*, ed. Norman Geras and Robert Wokl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184-204.

本视角,并没有具体地探讨上述问题。本文将从福柯的视角出发,将其充分地展开,深入地探讨上述问题,进而完善和反思福柯的相关思想。

### 一 康德启蒙观的实质

康德首先将启蒙运动定义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sup>①</sup>紧接着他又对不成熟状态作了定义:“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sup>②</sup>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不成熟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最后他借用罗马诗人贺拉士的诗句“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在理智的运用上,康德区分了“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理性的私下运用”。康德认为理性的公开运用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而私下运用指“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sup>③</sup>。康德认为,启蒙的条件就在于给予理性公开运用的自由,在理性的私下运用上,要绝对地服从。

福柯认为康德关于启蒙的上述定义虽然简短,却不是十分清晰。其中存在着四个方面的疑难<sup>④</sup>。

第一,福柯指出,康德将启蒙消极地定义为脱离(Ausgang),即从某种形态中摆脱,却没有说明朝向何处。虽然康德的启蒙定义表面上看来是要脱离不成熟状态,朝向成熟状态,然而在福柯看来,康德对成熟状态和不成熟状态的区分以及将启蒙定义为脱离不成熟状态的实质却并不明了。

第二,福柯认为,康德启蒙定义——“人类脱离不成熟状态”中的“人类”存在着含糊。虽然看起来“人类”是指作为种类的人类,然而到底是哪些人,康德所认为的启蒙的代理人到底是谁?这些问题在福柯看来并不清楚<sup>⑤</sup>。

第三,福柯指出,在康德的定义中,首先是以描述句呈现的——“启蒙是人类脱离不成熟状态”,而在定义的结尾,却是以规定句结束——“启蒙的座右铭是敢于认知”,这种描述句如何同时是一种规定句?

第四,康德区分了理性的私下运用和理性的公开运用,认为保证理性的公开运用是启蒙的关键,然而他认为对理性的私下运用的限制反而会促进启蒙,并且他将普鲁士的国王腓德烈当作启蒙运动的光辉典范,因为他做到了允许臣民“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sup>⑥</sup>。福柯认为,这里需要弄清楚的是理性的自主运用(理性的公开运用)如何同服从(理性的私下运用)兼容<sup>⑦</sup>。

在这四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康德“不成熟状态”的实质。第二个问题涉及到谁是启蒙运动的执行者和代理人。这两个问题涉及到的是康德启蒙观的实质。第三个问题陈述句如何同时是规定句,是福柯从康德行文的句式转换上的思考,从描述句到包含对他人要求的规定句,这种转化的背后指向的是第四个问题,即理性的自主运用与服从之间的兼容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福柯认为,不成熟状态并不是人类童年时的自然无能的状态,因为康德明确地指出不成熟状态的原因并不在于缺乏理智,不成熟状态也不在于处于特定的法律和政治下,被剥夺权利的合法行使的状态。因为康德指出它的原因是自己造成的,他们不愿意独立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在无人引导的情况下就对理智的运用感到无能为力,而自愿地屈从于他人的权威,不成熟状态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意志的状况,在于懒惰和怯懦。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福柯还从康德关于理性的公开运用与私下运用的区分和规定中揭示了不成熟状态的特征。

①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3页。

②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3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及下文的“理智”,康德使用的是“Verstandes”,也有极少译本将其翻译成《纯粹理性批判》中作为认识能力之一的“知性”。笔者认为康德在这里指的是“理智”而非特指“知性”。首先,在这篇发表在面向大众的杂志上,康德应该使用的是这个词的通常含义,即“理智”,而非他在批判哲学中的独特术语“知性”。其次,后文中康德谈及“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理性的私下运用”,如福柯所认为的那样,康德启蒙观的核心是关于理性使用的问题。“理智”更加接近表意识能力的“理性”。

③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3、26页。

④这里的四个方面是笔者根据《何为启蒙?》和《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两个文本的不同表述整理而成。

⑤Michel Foucault,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2-1983*, trans.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8. 译文参考了于奇智的中译。参见:福柯《康德与启蒙问题(法兰西学院1983年1月5日讲座)》,于奇智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32-47页。下同。

⑥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31页。

⑦《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我们首先来探讨康德是如何看待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理性的私下运用的。康德认为有些限制会有碍启蒙,有些限制反而会促进启蒙。他以问句的形式写道:“哪些限制是有碍启蒙的,哪些不是,反而是足以促进它的呢?”然后他接着说:“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这表明他认同对“理性的私下运用”的禁止,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在其所担任的公职岗位或职务上,是在执行他人的委托、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义务遵循委托人的要求。而理性的公开运用则不同,理性的公开运用是以学者的身份在使用理性的,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委托,所以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公众表达意见。他进一步认为,对理性的私下运用的禁止以及对理性的公开运用的鼓励将对社会有利。因为在社会观上,康德将社会类比成机器,认为“就涉及共同利益的许多事物而言,则我们必须有一定的机器”<sup>①</sup>。康德认为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对应着公民的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公职岗位或学者。在社会上担任公职岗位的个人都是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在这种情况和身份下的理性的运用是“私下的运用”,为了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行,处在社会机器中的个人必须要服从。他列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之一是关于军官的例子,他认为一个服役的军官在接受上级下达的命令时,尽管他认为上级的命令不合理,但这时他争辩就会很坏事,他必须服从<sup>②</sup>。但是公民除了是机器的一部分同时也作为学者,即作为“整个共同体的、乃至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sup>③</sup>,此种身份下是“理性的公开运用”,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需要允许理性的公开运用。

福柯将这两种身份分别解读为“个人”和“普遍的主体”。他认为在理性的私下运用上,如康德认为的那样,我们是社会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我们不是作为普遍主体而发挥作用,而是作为个人而发挥作用”<sup>④</sup>,因而我们需要绝对服从。这种“个人主体”很容易引起误解,它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体,不是指与他人和群体相对的个人。它必须放在社会机器中去理解和定义,指的是在社会机器中担任一个部件和职位的个人,这时我们处在一种委托和义务关系中,处在一种维持社会机器式的运作的需要中。我们除了作为社会机器中担任某个职位的个人外,还有另外一种身份,即作为普遍的主体。这里普遍主体中的“普遍”是相对于个人主体处于特定的委托关系而言的,这时我们虽然还是个体,但是我们是在面向全体有理性者并作为有理性者存在,此时我们摆脱了委托和义务关系而作为学者而存在,因而不需要服从,具备争辩的权利<sup>⑤</sup>。福柯认为,康德认为的成熟状态是“将争辩与服从分开,使服从在私下运用方面被强调,使完全而绝对的争辩自由在公开运用方面被强调”,而在不成熟状态是“不管何种情形,在私下运用和公开运用两方面,我们都服从,结果我们没有争辩”<sup>⑥</sup>。

关于第二个问题——谁是启蒙的代理人,福柯指出,康德启蒙定义中从事脱离的人既不是人类自身也不是某些人,因为康德已经明确地指出,“任何一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艰难的”<sup>⑦</sup>。而且在广大群众设立的保护者中间,虽然存在着通过自己的精神奋斗摆脱不成熟状态的少数人,当他们向被保护者传播启蒙精神的时候,被保护者反而会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想法。因而福柯认为,“普鲁士的腓德烈就是启蒙的核心人物,启蒙的主要代理者,他恰当地重新分配服从及理性的私下运用与普遍性及理性的公开运用之间的相互作用”<sup>⑧</sup>。因为只有普鲁士的国王腓德烈做到了让其公民“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sup>⑨</sup>。

上述两个问题清楚地反映出康德启蒙观的实质。康德启蒙观的实质在于,在合法的界限内我们应该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而超出了这个界限我们则应该听从权威、绝对地服从。而成熟状态和不成熟状态的区分也在于此:成熟状态下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运用自己的理性、什么时候应该服从,而在不成熟状态下,我们都依从于权威。普鲁士的国王腓德烈正是因为让其公民做到了绝对的服从和争辩的完美结合,因而成为了康德眼中

①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5、25—26、26页。

②参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6页。

③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6页。

④Michel Foucault,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2-1983*, 35.

⑤Michel Foucault,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2-1983*, 36.

⑥Michel Foucault,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2-1983*, 36.

⑦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4页。

⑧Michel Foucault,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2-1983*, 38.

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31页。

启蒙的榜样和代理人。福柯据此认为,启蒙的实质是由“意愿、权威、理性之使用这三者的原有关系的变化所确定的”<sup>①</sup>。在不成熟状态下,因为意愿的原因,出于懒惰和怯弱,而没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因而听从权威。启蒙恰恰是要走出这种不成熟状态,走向成熟状态。在成熟状态下,意愿使理性在合法界限内运用,而超出界限时则依从权威。

## 二 福柯的视角

上文表明,康德启蒙观的实质在于把握住理性的自主运用和服从的界限。在成熟状态下,在界限之内我们必须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而超出界限我们则应该绝对地服从。而在不成熟状态下,无论是界限内和界限外,我们都服从。然而如何划分和确定这个界限?这涉及到上述第三和第四个问题,即理性的自主运用和绝对的服从如何兼容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确定理性的自主运用和服从之间的界限。福柯认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康德启蒙观与其批判哲学的关系,因为批判哲学的核心工作就是为理性及其运用划界。

福柯对康德启蒙观和批判哲学的关系的论述非常简短,只有几段论述。在《治理自我和治理他人》中,他是从康德用来说明不成熟状态的例子着手来说明康德三大批判与启蒙之间的关系的。康德用来说明什么是不成熟状态的例子是这样:“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要是我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sup>②</sup>福柯认为:“在这三个例子我们可以重新发现三大批判。第一个例子涉及理性的问题,第二个例子牧师涉及道德良知的问题,医生的问题将成为《判断力批判》的核心问题之一。”<sup>③</sup>福柯并没有讨论医生的例子与《判断力批判》的关系,限于篇幅,我们也主要探讨书和牧师的例子(即启蒙)与《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的关系。

福柯认为,第一个例子即书的问题是关于理性的问题,而后者是《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问题。福柯认为《纯粹理性批判》使我们学会将我们的理性变成合法的运用,也就是在理性的合法界限内使用。当我们在理性的合法界限内使用理性时,我们就可以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无须依靠书的权威。而当我们超出理性的合法界限使用理性时,我们只能求助于权威,从而将我们自身置于不成熟状态<sup>④</sup>。福柯的这些论述勾勒出了《纯粹理性批判》和康德启蒙观的关系:康德启蒙观的实质在于要在理性的自主运用和服从之间取得平衡,在理性的合法界限内,我们必须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而超出这个界限,则需要绝对的服从。这就涉及到理性的自主运用和绝对的服从之间的兼容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确定理性的自主运用和服从之间的界限,在于对理性进行划界,而《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工作就是对理性能力进行考察和划界。《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的书名体现了这本书的任务。在康德那里,“理性”有多方面的含义,其中重要的两个方面是作为感性、知性、理性等三分中的理性和包含感性、知性和理性在内的人的认识能力。书名中的“理性”指的是人的认识能力,而“纯粹”意为先于一切经验并具有普遍必然性,“批判”指的是考察和划界。正如康德所说,“我所理解的纯粹理性批判,并不是对某些书或体系的批判,而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是就一切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知识来说的”<sup>⑤</sup>,因而“纯粹理性批判”指的是对认识能力的考察和划界。《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理性界限的划定是启蒙事业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只有划定了理性的界限,清楚地知道理性使用的权限,才能在合法的界限内勇敢、自主地使用理性,才能在超出理性的合法界限时绝对地服从。

在第二个例子中,福柯认为牧师的问题完全涉及到良知的问题,而这是《实践理性批判》所涉及的问题。福柯对此的论述更为简短。他指出:“《实践理性批判》将教我们懂得我们不应该使自己的义务取决于我们随之而来的命运,并且必须同时完全理解我们应该运用我们自己的良知来决定我们的行为。”<sup>⑥</sup>反之,福柯认为:“如果我们将我们的道德行为取决于我们随后的命运,牧师将成为我们意志的第一原则。”<sup>⑦</sup>我们需要清理出福柯这段简短的论述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关系。《实践理性批判》处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德性和幸福的关系问题。

①《福柯集》,第530页。

②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4页。

③Michel Foucault,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2-1983*, 30.

④Michel Foucault,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2-1983*, 30.

⑤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⑥Michel Foucault,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2-1983*, 31.

⑦Michel Foucault,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2-1983*, 32.

在尘世生活中,德性和幸福往往是分离的。德性遵从的是道德律,而幸福遵从的是自然律。虽然两者都是普遍必然的,但是这两种普遍必然性是不同的。道德律的普遍必然性具有“应当”的特征,它是一道“命令”,它出自理性的设定,想要具有德性则应该听从这种“绝对命令”。而自然律的普遍必然性则来源于知性的先天范畴,幸福遵从的是其中的因果律。福柯的这段论述应该放在德性和幸福这样的矛盾和分离下去理解。在实践领域,理性的合法运用应当使我们的行为听从的是“绝对命令”,遵从道德律,而非使我们的行为取决于这些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后者依从于因果律而追求幸福来决定我们的行为。当我们遵从于“绝对命令”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自主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因为这些“绝对命令”是由有理性者共同设定的,遵从这些“绝对命令”就是在自主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当我们不遵从于“绝对命令”,而把我们的行为建立在行为所带来的实际好处时,建立在以后的命运时,因为我们无法预知未来、预知命运,我们则需要求助于牧师(在某些情形下,牧师将透露我们今后的命运),求助于权威,从而将我们置身于不成熟状态。

总之,福柯认为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启蒙的序曲,“批判事业与启蒙过程将相互补充、相互引发,都将成为必然”<sup>①</sup>。因为批判的主要职能是为理性及其使用进行划界,由此去界定人们能够认识什么、应该做什么以及能够期望什么,以确定何时对理性的使用是恰当的,何时是非法的。在理性的界限内,我们将发现自主的原则而无须听从权威<sup>②</sup>。超出了理性的界限,我们将会失去自主性的原则,只能听从权威。

### 三 对福柯论述的完善和反思

福柯的上述论述只是初步地勾勒出了批判哲学和启蒙之间的互补关系。然而,涉及到康德启蒙观实质的理性的公共运用和私下运用的区分依据的是什么呢?理性公共运用与私下运用以及普遍主体与个人主体的区分与批判哲学中对理性的界限的划定的对应关系具体是怎样的?在批判哲学中,理性的界限问题导致了现象界和本体界的区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认为理性的本性在于“逾越”,它总是试图超出经验的范围运用知性的范畴进行无限的推理,从而得出一些无法被经验检验的知识,“理性”超出经验的范围的使用也会导致“二律背反”,因此康德提出为理性划界、限制知识,为《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信仰留下地盘。在(理论)理性的领域,理性的界限内指的是现象界,(理论)理性的界限外是本体界。而在实践理性中,(实践)理性的界限内是道德世界(本体界),(实践)理性的界限外是幸福世界(现象界)。但对于康德启蒙观中理性的公共运用和理性的私下运用是如何对应着批判哲学中两个层面的现象界和本体界的,福柯却并没有明确地探讨过,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和完善福柯的论述。

叶秀山先生敏锐地注意到上述福柯对康德启蒙和批判哲学关系的勾勒,并进一步从哲学的层面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阐释<sup>③</sup>。他认为,“康德正是在有限、无限这样一个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和运用私人—私下和公开—公众这两个词的”<sup>④</sup>。因为理性的私下运用是有限的,正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在理性的私下运用时,我们是机器中的部件。而理性的公共运用是无限的,因为康德认为在理性的公共运用时,我们是“整个共同体的、乃至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sup>⑤</sup>。叶秀山先生还认为,“理性—自由在本质—本体界,是无限的,而在现象界,则是有限的”。(理论)理性之所以在现象界是有限的,是因为理论理性的合法使用无法僭越经验范围,僭越经验、现象的范围会导致“二律背反”,因而理论理性只能在经验的范围内使用。叶秀山先生进而将私下运用的理性对应于《纯粹理性批判》中处在现象界中的理性,他认为“在知识王国,理性的自由是受到限制的,是有限的,就如同自由在私下一私人范围内受到限制一样”<sup>⑥</sup>,而将公开运用中的理性对应于《实践理性批判》中处在本体界中的理性。

然而从福柯的上述阐释中,在知识、理性的界限内,我们应该自主地运用理性,理性的运用是被允许的,因

① Michel Foucault,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2-1983*, 31.

② 福柯《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Ⅱ》,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页。

③ 叶秀山指出:“这种关系,在上面提到的福科的论文中已经提出,但需要从哲学层面进一步阐述。”参见:叶秀山《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页。

④ 叶秀山《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第133页。叶秀山先生的原文中有许多引号,代表着该词的独特含义和他的独特见解。但为了保持本文的行文风格的一致性,引文去掉了原文中的引号。下同。

⑤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6页。

⑥ 叶秀山《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第133、137页。

而与之对应的是理性的公开运用,而在知识界限内的应该是现象界。超出知识、理性的界限我们应该求助于权威,理性的运用是被禁止的,因而与之对应的是理性的私下运用,而超出知识界限的是本体界。这与叶秀山先生理性的公开运用对应着本体界、理性的私下运用对应着现象界恰恰是相反的。因此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注意到,福柯从《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两个层面勾勒康德启蒙观与其批判哲学的关系时,两个层面是分开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其启蒙观之间的互补关系在于当(理论)理性合法地使用时,即在现象界使用时,我们可以自主地运用理性,这对应着启蒙中的理性的公开运用。而(理论)理性非法地使用时,即超出了现象界到达本体界(这时的本体界指的是物自身)时,理性的运用将会导致矛盾,我们只能求助于权威,因而理性的运用是不被允许的,这对应着启蒙中理性的私下运用。《实践理性批判》与其启蒙观的互补关系在于当我们将自己的道德行为依从于“绝对命令”时,合法、正当地使用(实践)理性时,即依从于普遍理性的共同设定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自主地使用理性,这对应着启蒙中理性的公开运用。当我们将自己的道德行为取决于这种行为带来的命运时,非法、不恰当地使用(实践)理性时,我们需要求助于牧师,依从于权威,这对应于启蒙中理性的私下运用。这两个方面都有合法和非法的使用,因而有两个层面的合法和非法的运用。叶秀山先生的上述对应关系实质上是这两个方面合并成了一个方面。他认为理性在现象界中的使用是有限的,对应着启蒙中的理性的私下运用,是非法的;理性在本体界中的使用是无限的,对应着启蒙中的理性的公开运用,是合法的。从而只剩下一个层面上的合法与非法的运用,进而导致了叶秀山的阐释与福柯相矛盾。

因此我们需要反思康德区分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是否是以“有限”和“无限”的哲学层面来界定的。前文提到,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对应着公民的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福柯将这两种身份分别解读为“个人”和“普遍的主体”。在理性的私下运用上,我们是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部件并作为“个人”而发挥作用的,因而是有限的。而在理性的公开运用上,我们置身于普遍的环境中,是作为有理性的主体而面向全体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因而是无限的。有限和无限只是理性的私下运用和理性的公开运用的特征。然而比有限和无限这种特征更为根本的是使用理性时主体的身份。理性使用时主体的身份才是决定理性是公开运用还是私下运用、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区分的依据。当使用理性是以“普遍的主体”的身份进行时,是理性的公开运用,理性的使用是合法的,它是被康德所鼓励的。而当理性的使用是以“个人”主体的身份进行时,是理性的私下运用,是非法的,是被康德禁止的。

普遍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区分同样存在于《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并起着重要的作用吗?普遍主体如何对应着第一批批判哲学中的现象界和第二批批判中的道德世界(本体界),而个人主体如何对应着第一批批判中的本体界和第二批批判中的幸福世界(现象界)?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继承笛卡尔的观点,后者认为认识总是处在我们观念之中,而事物在我们观念之外。笛卡尔试图通过上帝的至善来确保被认识的事物和在我们观念之外的事物之间的符合,因为他认为上帝不会欺骗我们。康德将这些观点进一步发展成了现象和物自身的区别,并且他还认为认识总是在现象之中,然而物自身的世界是不可认识的。人的认识能力(即广义的理性)是通过感性的时空先天形式和知性的十二范畴对物自身刺激我们的感官形成的杂多进行整理,因而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康德将此在现象中获得的普遍必然性知识的过程称为“人为自然立法”,就是通过人的时空先天形式和知性的十二范畴附加在由物自身的刺激形成的杂多上,从而实现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由此实现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即认识的过程不是认识对事物的符合,而是事物对我们认识(即先天形式)的符合。康德认为当理性想要利用知性的范畴脱离经验进行推理时,进入到本体的世界(物自体是其中之一)时,必然会产生矛盾,因而应该将认识能力限制在现象界,超出现象界到达本体界时,只能产生“二律背反”。这里现象界对应的是普遍主体,而本体界对应的是个人主体。因为对现象界进行“人为自然立法”的人并非某个人,而是人类中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时空先天形式和十二知性范畴,因而是“普遍的主体”。只有立足在这种普遍的主体中,知识才对所有人有效,而非仅仅对某一个人有效。当超出现象界到达本体界时,运用知性的范畴进行推理而脱离了经验的检验,这时得到的知识的有效性只对进行推理的个人有效,因为它是基于个人主体而进行的,其他主体无法依据经验对其进行有效的检验。由此可见,普遍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区分同样存在于第一批批判中,并起着重要的作用。现象界对应着普遍主体,因为它的普遍必然性是基于普遍主体的时空先天形式和知性范畴而确立的。而本体界(在第一批批判中主要指的是物自身)对应着个人的主体,当脱离经验的检验运用知性范畴进行推理时,必

然会导致对立的看法,这种看法无法对全人类有效,只能对于某些个人有效。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前文提到德性和幸福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矛盾和分离,德性遵从道德律,而幸福遵从自然律中的因果律。为了使得道德律像自然律一样具有绝对普遍的客观有效性,康德区分了行动的准则和实践的规律,前者只对个人有效,而后者则对一切有理性者有效。这种对一切有理性者有效的道德律是理性对欲求能力(意志)所颁布的绝对命令。绝对命令具有应当的特征,它们是无条件的。相对于有条件的命令,即那种为了达到某种后果而必须采取的行动准则,绝对命令则不考虑行为的实际结果。这种绝对命令不是基于个人而颁布的,而是基于普遍的主体颁布的命令,因为它们“不仅对于人,而且一般地,对于一切有理性者的东西,都具有普遍的意义”<sup>①</sup>。而当人们将自己的行为取决于他行动的后果,遵从自然律中的因果律而追求幸福以致违背道德律时,这完全是基于个人主体的行为。因而我们看到,普遍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区分同样存在于第二批判中并起着重要的作用,德性世界对应于普遍的主体,而幸福世界对应于个人主体。

由此可见,个人主体和普遍主体的区分是联系康德启蒙观和他的批判哲学的关键。在批判哲学中,理性在使用方式上区分成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又进一步依据普遍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区别区分为理性的合法使用与理性的非法使用。在启蒙观中,依据普遍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区分,理性的使用方式区分为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与启蒙的对应关系<sup>②</sup>正是依据普遍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区分进行的。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启蒙观的对应上,当理性的使用是以普遍的主体的身份进行时,理性的使用都是合法的,(理论)理性在现象界的使用对应着启蒙中的理性的公开运用,这种使用没有超出经验范围,不会导致矛盾,因而可以自主地使用理性而不需要求助于权威。当理性的使用是以个人主体的身份进行时,这时理性的使用是非法的,因为理性逾越了经验的范围而到达本体界时,超出了经验的检验会导致矛盾,只能求助于权威,从而需要服从。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与启蒙观的对应上,当(实践)理性的使用是以普遍主体的身份进行时,实践理性遵从绝对命令,依从道德律而无须知道今后的命运(行为的后果),因而可以自主地使用理性而无须求助于权威,它对应着启蒙中的理性的公开运用。而当(实践)理性的使用是以个人主体的身份进行时,实践理性遵从因果律而寻求今后的命运时,它就因需要求助于权威而失去自主性,它对应着启蒙中理性的私下运用。

## 五 结论

总之,福柯认为康德的启蒙观同批判哲学是紧密相关的,批判哲学是启蒙的序曲和前提。康德启蒙观的实质在于恰当地处理理性的自主运用和服从的关系,在理性的恰当使用的界限内,人们应当自主地使用理性,超出这个界限,则应绝对地服从。区分理性及其使用的界限对于启蒙而言至关重要,而批判哲学的核心工作恰恰在于为理性及其使用划清界限,以确定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应当做什么和能够希望什么。理性使用的合法性与否取决于理性使用时主体的身份,使用理性时是以普遍主体还是以个人主体的身份进行的,将决定理性使用是合法还是非法的。这不仅适用于启蒙中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而且也适用于批判哲学中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使用。普遍主体和个人主体身份的区分是联系康德启蒙观和其批判哲学的桥梁。

[责任编辑:帅 巍]

<sup>①</sup>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sup>②</sup>这里的“对应关系”不是一种等同关系,理论理性在知识的界限内的使用(第一批判)和实践理性遵从道德律时的使用(第二批判)并不等同于启蒙中的理性的公开运用,理论理性在本体界的运用和实践理性追求幸福依从因果律时的运用也不等同于启蒙中理性的私下运用。同样我们应该注意到:“普遍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含义在启蒙观和批判哲学中也不完全等同,而是相似和重叠的。“普遍主体”在启蒙观和批判哲学中虽然有些许差异,但都大致指的是有理性者的共同性或共同设定性。个人主体在启蒙中指的是处于委托关系中的个人,而在批判中,指的是无法对所有有理性者有效,而仅对某些个人有效的个人。